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三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5 冊

張橫渠思想析述

劉 錦 賢 著

程伊川心性學之研究

張 德 麟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張橫渠思想析述 劉錦賢 著／程伊川心性學之研究 張德麟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
98〕

目 4+116 面／目 2+13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編：第 15 冊)

ISBN：978-986-6528-85-9 (精裝)

1. (宋) 張載 2. (宋) 程頤 3. 傳記 4. 學術思想 5. 宋元哲學
125.14 98001677

ISBN - 978-986-6528-85-9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三 編 第十五冊

ISBN：978-986-6528-85-9

張橫渠思想析述 程伊川心性學之研究

作 者 劉錦賢／張德麟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 年 3 月

定 價 三編 28 冊 (精裝) 新台幣 4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張橫渠思想析述

劉錦賢 著

作者簡介

劉錦賢，臺灣省彰化縣人，民國四十二年生。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畢業、國文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彰化縣立永靖國中、臺北市立北一女中國文教師，臺北工專共同科講師、臺北科大共同科副教授，現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講中國思想史、宋明學術及周易等儒學相關課程。著有《戴東原思想析論》、《儒家保生觀與成德之教》、《孟子的生活智慧》等書，並發表〈易道之「懼以終始」論述〉、〈莊子天人境界之進路〉、〈眾生病則菩薩病〉、〈康德美學析論〉等中西哲學論著數十篇。

提 要

本書旨在表彰橫渠學說之精華，疏通後人對橫渠思想之誤解，以見橫渠思想在儒學傳承中之地位。所據文獻以橫渠之著作為主，以先秦諸子、宋明諸儒之專著及近人對橫渠思想之論著為輔。一則歸納橫渠之重要思想，一則透過橫渠思想與道釋二家及宋明諸儒思想之比較，以表彰橫渠思想之價值。文分九章：

第一、二章分述橫渠之生平事蹟及其思想淵源；第三至五章為橫渠思想之核心，分天道論、心性論與工夫論三方面闡述橫渠義理之學；第六章分論橫渠在政治、社會、教育及軍事方面之見解，第七章討論橫渠對道釋批判之當否，第八章衡定先儒對橫渠思想之抑揚，第九章為結論。

橫渠之思想實乃先秦儒學進一步之推闡，其形上學乃是參和不偏，兼體無累，以實理貫實事，由實事顯實理之道德形上學；道釋二家之思想對橫渠思想之形成僅有刺激之作用，並無本質之影響；其在天道及心性方面之睿見，實足以確立橫渠思想在中國思想史上之地位。



目

次

第一章	生平事蹟	1
第二章	思想淵源	9
第一節	儒學以內之因素	9
一、	先秦儒學之啓示	9
二、	當時學風之導引	11
第二節	儒學以外之因素	13
一、	佛老思想之衝擊	13
二、	時代環境之刺激	14
第三章	天道論	17
第一節	氣之內涵	18
第二節	氣與本體	21
一、	神與氣	21
(一)	氣與鬼神	21
(二)	氣與妙化之神	22
二、	太虛與氣	25
三、	道易與氣	29
四、	太極與氣	30
五、	太和與氣	32
第四章	心性論	35
第一節	性與命	36
一、	性命與天道	36

二、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	37
三、盡性與成性	39
四、理命與氣命	41
第二節 心之作用	45
一、心之知能	45
二、心之盡性	49
第五章 工夫論	51
第一節 博學慎思	51
一、窮理博文	51
二、疑以進學	54
三、立說明性	55
第二節 持敬守禮	56
一、以禮持性	56
二、敬慎謙柔	58
第三節 知幾存誠	59
一、明善知幾	59
二、操持本心	61
三、剛健不息	62
第四節 平易自然	64
一、却除成心	64
二、置心平易	66
三、虛靜自然	67
第六章 政治社會教育及軍事思想	69
第一節 政治思想	69
一、井田	69
二、封建	73
三、肉刑	74
第二節 社會思想	75
一、宗法	75
二、祭祀	76
三、喪葬	78
第三節 教育思想	80
一、循序漸進	80

二、因材施教	81
三、適時導引	81
第四節 軍事思想	82
第七章 對道釋之批判	85
第一節 批判老莊	85
一、批 老	86
(一) 有生於無	86
(二) 聖人不仁	87
(三) 徇生執有	88
(四) 谷神有限	89
二、批 莊	89
(一) 妄說神人	89
(二) 不知窮理	90
第二節 批判釋氏	91
一、幻化乾坤	91
二、厭棄人世	92
三、依心起法	93
四、不知鬼神	93
五、以生爲性	94
第八章 先儒對橫渠學說之抑揚	95
第一節 程明道	95
第二節 程伊川	97
第三節 朱 子	101
第四節 劉戡山	104
第五節 王船山	106
第九章 結 論	109
參考書目	113

第一章 生平事蹟

先生諱載，字子厚，先世大梁（即汴梁，今河南開封）人。曾祖某，生唐末，歷五代之亂而不仕，以子貴，贈禮部侍郎；祖名復，宋眞宗時爲給事中、集賢院學士，贈司空；父名迪，仁宗時爲殿中丞，知涪州（含四川涪陵），贈尚書都官郎中。父卒於涪州任內，諸孤皆幼，〔註1〕不克歸，因僑居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註2〕橫渠爲先生講學之所，故世稱之曰橫渠先生；該鎮地當關中，故世稱先生之學曰關學。〔註3〕

先生眞宗天禧四年（1020）生。〔註4〕始就外傳之時，即有超卓之志氣，知虔奉父命，守不可奪，父自是知其爲可造之才。父卒之後，年雖少，然頗能自立，博學無方。始則好孫吳之學，嘗與邠人焦寅遊；寅喜談兵，先生悅

〔註1〕所謂諸孤，其數究係多少？張戢，字天祺，爲橫渠之弟，（見《宋元學案·卷十八》，頁24）但不知尚有其他兄弟否？橫渠所作〈張天祺墓誌銘〉云：「治其喪者……從母弟質涼，甥宋京。」（《皇朝文鑑·卷一百四十四》，頁9）由有甥，知其有姊妹，亦不詳其數。則諸孤之數，至少有三。又天祺神宗熙寧九年卒，得年四十七，（見〈張天祺墓誌銘〉）橫渠次年亦卒，享年五十八，則其父卒時，橫渠年當十歲有餘，而未逾十六（參閱註10），否則不得稱「幼」也。

〔註2〕1. 以上悉據呂大臨所作〈行狀〉（《張子全書·卷十五》頁11至14，《張子全書》以下簡稱《全書》）而稍異文字。2.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陝西、鳳翔府、郿縣、新羅堡載：「橫渠鎮，在縣東北五十里，以橫水所經而名，宋儒張子所居。」（《讀史方輿紀要·卷五十五》，總頁2425）郿縣在太白山之北，北臨渭水。范育《正蒙序》云：「子張子校書崇文，未伸其志，退而寓於太白之陰，橫渠之陽。」（《皇朝文鑑·卷九十一》，頁1）

〔註3〕劉子卿曰：「橫渠倡道學於關中，世謂之關學。」（《宋元學案補遺·卷十八》，頁12）。

〔註4〕此由卒年及享年推得。

之，至欲結客取洮西失地。仁宗康定元年（1040），朝廷對西夏用兵，以夏竦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韓琦、范仲淹副之。范公一代巨儒名將，先生年輕志大，慨然以功名自許，因乘便上書謁之，時年二十一。^{〔註5〕}范公見其器宇非凡，足以擔負弘揚聖學之重任，欲成就之，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註6〕}於是勸之讀〈中庸〉。〈中庸〉乃聖賢性命之學，范公獨勸先生讀之，足見其遠識。此番勸導，乃先生生命方向之轉捩點，亦是先生潛心聖學之起點，同時奠定先生日後義理型態之初基。則范公此一指點，於先生之聖賢事業，具決定性之影響力，最值重視。全祖望曰：「高平一生粹然無疵，而導橫渠以入聖人之室，尤爲有功。」（《宋元學案·卷三，頁1》）

惟先生雖愛讀〈中庸〉，然於性命精微之理，一時未盡透澈，乃企圖自釋老之書中求之；累年而不契於二氏之學，乃返而求之六經。此一番周折，使先生認識二氏之學之面貌，並知其與聖人之學不類。在與佛、老對勘下，益顯聖人之學之充實圓盈、博厚高明；足以安頓生命，立己成人，了無虧欠。自是之後，先生即慨然以聖人之學自任，並力斥二氏之失。則此一番周折，其影響於先生者，非是負面之淪於佛老，乃是正面之提昇其對儒學之見識，激揚其德慧。^{〔註7〕}此後十餘年間，先生潛心聖學，尤於《易傳》用功最深。雖未仕，而聲名已著。「文潞公（文彥博）以故相判長安，聞先生名行之美，聘以束帛，延之學宮，異其禮際，士子矜式焉」（〈行狀〉），其見重於當世如此。

仁宗嘉祐初，至京師，「嘗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道學傳〉），足見其於《易》理已深造自得，卓爾成家。「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曰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道學傳〉），其謙虛讓賢之胸懷有如是者。^{〔註8〕}與二程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

〔註5〕此據《宋史·卷四百二十七道學傳》所載。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云：「當康定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康定乃宋仁宗年號，且僅一年，康定元年即西元1040年，以生年推之，此時橫渠當年二十一。麥仲貴《宋元理學家著述生卒年表》云：「今考張載年十八，時爲景祐四年，時范仲淹知潤州（今江蘇潤江），而載二十一歲時，則正爲康定元年，顯然〈行狀〉誤。」

〔註6〕范氏之言據《宋史·道學傳》，〈行狀〉無「可樂」二字。

〔註7〕此等周折與明道相似，伊川所作〈明道先生行狀〉云：「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十一》：《二程集》，頁638）。

〔註8〕二程是時年二十三、四，於儒學已有相當造詣，此後橫渠之於《易》，與二程當有互相切磋之功。（請參閱陳正榮《張載易學之研究·第三章·第三節》：

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乃盡棄異學，淳如也。」〔註9〕先生既得時賢互相印證聖人心法，致力於聖人之學，益是沛然莫之能禦矣。

嘉祐二年，登進士第，始仕祈州（今河北無極）司法參軍（掌刑法），此先生仕途之始也。遷丹州雲巖縣（今陝西宜川縣北）令，寓政於教，務敦本善俗。「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間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此皆三代遺法，而先生躬行之。「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里閭。間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知」（〈行狀〉）。此看似煩瑣，然必如是，方能上情下達，方不愧爲民之父母。「京兆王公樂道嘗延致郡學，先生多教人以德，從容語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否？』學者聞法語，亦多有從之者」（〈行狀〉）。由此可見先生言行感人至深也。

其後又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今甘肅隴西縣西南）軍事判官公事。「在渭，渭帥蔡公子正特所尊禮，軍府之政，大小咨之。先生夙夜從事，所以贊助之力爲多」（〈行狀〉）。則先生早年之好孫吳，並非全無是處也。「並塞之民常乏食而貸於官，帑不能足，又屬霜旱，先生力言於府，取軍儲數十萬救之」（〈行狀〉），此先生民胞物與之具體表現也。「又言戍兵徒往來，不可爲用，不若損數以募土人爲便」（〈行狀〉），此頗能斟酌邊邑之實況而善爲之計，乃先生軍政之卓見。

神宗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爲相，變法改革，實行新政，朝廷亟須用人，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先生於朝，曰：「張載學有所本，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上然之。既入見，上問治道，先生對以漸復三代之規模，曰：「爲政不法三代，皆苟道也。」上悅，曰：「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先生謝曰：「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月，繼有所獻。」上於是以爲崇文校書。他日，見王安石，王氏語之曰：「新政之更，

二程《易》道對張載《易》學之頗輔）。

〔註9〕《伊洛淵源錄》載：「呂與叔作〈橫渠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尹子言之。伊川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朱子曰：「按〈行狀〉今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淳如也』，其他不同處亦多，要皆後本爲勝，疑與叔後嘗刪改如此，今特據以爲定。」（以上均見《伊洛淵源錄新增·卷之六》，頁10）

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先生對曰：「朝廷將大有爲，天下之士願與下風，如與人爲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王氏意欲先生助之推行新法，而先生則望王氏廣納眾善，不可一意孤行，是以與王氏不合。先生見事不可爲，欲辭歸，不得。而王氏因不得先生之助，怨忌在心。適明州苗振獄起，王氏遂遣先生按獄浙東。明道爲之言曰：「張載以道德進，不能使治獄。」王氏曰：「淑問如皋陶，猶且獻囚，此庸何傷？」遂遣之。先生殺其罪；獄成，還朝。會弟天祺（時爲御史裏行）累章議王氏及其黨之罪，乞罷新法；遂去御史職，待罪知公安。（見《宋元學案·卷十八，頁24、25》）先生益不安，乃以疾謁告，西歸橫渠。計先生自登第至罷歸，凡十三歲，此先生長期仕宦之日也，而皆居卑職。（此段參酌〈行狀〉、〈道學傳〉及〈學案〉）

先生既歸，乃益參造化之蘊，精性命之理，並講學授徒。〈經學理窟〉自道云：「某既閑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地又非會眾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著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來元不曾有人說著，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尙閑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與聞者，其已乎？其有遇乎？」（《全書·卷七》，頁6至7）關中雖非人文薈萃之所，然先生以爲事在人爲，且以仲尼之在洙泗、孔明之在西蜀自擬。以其自信而不疑，故敢勇於興教化，卒能與洛學爭輝也。

「橫渠至僻陋，有田數百畝以供歲計，約而能足，人不堪其憂，而先生處之益安」（〈行狀〉），苟非真得孔、顏之樂，曷克臻此？先生此時生活之苦，可由詩中見出，詩云：「渭南涇北已三遷，水旱縱橫數畝田，四十二年居陝右，老年生計似初年。」（《宋詩紀事·卷二十一》，總頁545）〔註10〕「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註10〕陳美圓《張載之禮學》繫此詩於年表四十二歲下，年表註十七云：「『四十二年居陝右』，明示其作詩之年。」按：橫渠至少在十歲以前居涇州，其父卒後始居陝右，則此詩之「四十二年」，專指其「居陝右」之年，非作詩之年也。又此詩最晚作於卒年五十八時，則其父卒時，橫渠之最大年齡爲十六歲。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行狀〉)。惟其如是專精，故能見天地之心，盡天命之性，成一家之言，質萬世之傳。「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行狀〉)；「以爲知人而不知天，求爲賢人而不求爲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之大蔽也」。(〈道學傳〉)此皆先生見道之言，故其感人也深。「又以爲教之必能養之然後信，故雖貧不能自給，苟門人之無貲者，雖糲蔬亦共之」(〈行狀〉)，是誠能與學者同患難、共甘苦者。「其自得之者，窮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異學，自孟子以來，未之有也」(〈行狀〉)。(註11)

「先生繼遭期功之喪，始治喪服，輕重如禮；家祭始行四時之薦，曲盡誠潔，聞者始或疑笑，終乃信而從之，一變而從古者甚眾，皆先生倡之」(〈行狀〉)。(註12)理之所在，情之所安，信行而不疑，人或一時不解，終必樂從也。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行狀〉)。知先生不獨具「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論語·子張》)之聖賢氣象，且具「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之容人雅量也。

「其家童子，必使灑掃應對，給侍長者；女子之未嫁者，必使親祭祀，納酒漿，皆所以養孝弟，就成德」(〈行狀〉)，(註13)其重視家庭禮教有如是者。「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嘗不開其端；其所至必訪人才，有可語者，必丁寧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行狀〉)，其誨人之誠有如是者。「歲值大欠，至人相食，家人惡米不鑿，將舂之，先生亟止之，曰：『惡殍滿野，雖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有擇乎？』甚或咨嗟對案不食者數四」(〈行狀〉)，其人飢己飢、人溺己溺之仁有如是者。

「熙寧九年秋，先生感異夢，忽以書屬門人，乃集所立言，謂之《正蒙》，出示門人，曰：『此書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類廣之，則吾將有待於學者。正如枯木之枝，枝別固多，所少者潤

〔註11〕 孟子排楊墨之「邪說」，橫渠則拒佛老之「狂言」，自孟子以來，誠未有如橫渠維護聖學之真且切者。〈行狀〉此言，洵非過語。

〔註12〕 橫渠云：「某始持期喪，恐人非笑，己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爲熟，己亦熟之。」(《全書·卷七》，頁7)

〔註13〕 〈行狀〉云：「先生娶南陽郭氏，有子曰因，(先生卒時)尚幼。」又〈文集抄〉有〈女戒〉(《全書·卷十三》，頁1)，知先生至少有一子一女。

澤華葉爾。』」（〈行狀〉）《正蒙》一書，乃先生辭官西歸後六、七年間參悟聖學之心得，為融攝《中庸》、《易傳》，會通《論語》、《孟子》之精心傑作，最足代表先生之聖學造詣，故特為後世所重。蘇昞〈序〉云：「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於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性理大全·卷五》，頁1）則《正蒙》初未分篇，季明為之編次耳。范育〈序〉云：「友人蘇子季明離其書為十七篇以示予，昔者夫子之書蓋未嘗離也，故有『枯枝碎盤』之說；然斯言也，豈待好之者充且擇歟，特夫子之所居也。今也離而為書，以推明夫子之道，質萬世之傳，予無加損焉爾。」（《皇朝文鑑·卷九十一》，頁2）言下似不以蘇氏之分篇為然。范〈序〉復論《正蒙》一書之價值，云：「惟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不言」；「《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礙者通之，眾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皇朝文鑑·卷九十一》，頁3）由此可見《正蒙》一書之嚴密峻拔，及在儒學傳承中所具之崇高地位。先生之著作，除《正蒙》外，見諸《全書》者，尚有《易說》、《經學理窟》、《張子語錄》、《文集》等，〔註14〕諸經說則僅散見之數條耳。〔註15〕

「（先生）嘗謂：『《春秋》之為書，在古無有，乃聖人所自作，惟孟子為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穿鑿。及《詩》、《書》、禮、樂之言，多不能平易其心，以意逆志。』方且條舉大例，考察文理，與學者緒正其說」；「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望道而欲見；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行狀〉）。凡此，皆有志未就。

〔註14〕《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九十二·張子全書十四卷附錄一卷》下云：「《語錄》、《文集》皆稱曰『鈔』，尤灼然非其完帙。」張元濟《張子語錄跋》云：「《張子全書·十二卷》有《語錄抄》，取以對勘，乃僅得六十七節，減於是本者約三分之二，然卷末有六節，為是本及《鳴道集》所無。」（《張子語錄·後錄》下所附）

〔註15〕有關橫渠之著作及後人之注釋，請參閱徐哲萍《張子氣運哲學管窺·第十章·第三節》，及陳美圓《張載之禮學·第一章·第二節》。

自熙寧二年至熙寧十年，先生雖以素位隱居，不得直接施澤於民，然正以此故，得以從容涵養，使學問極乎高明圓熟之境。並講學授徒，著作巨篇，講究禮制，化民成俗，凡此等聖賢事業，莫不完成於斯時。則昔日之不得意於朝廷，雖爲仕途之不幸，然就其個人之生命及儒學之重振而言，均屬大幸也。

熙寧十年，王安石已去相位，「秦鳳帥呂公（大防）薦之曰：『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乞召還舊職，訪以治體。』」詔從之。先生曰：『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辭，庶幾有遇焉。』（〈行狀〉）。先生雖去位之日久，然念念不忘朝廷。〈老大〉詩云：「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面峒嶢，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全書·卷十三》，頁12）此與范文正〈岳陽樓記〉所云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范文正公集·卷七》，頁4）之胸懷無異也。於是遂行，詔命同知太常禮院。「公卿聞風慕之，然未有深知先生者，以所欲言嘗試於人，多未之信。會有言者欲請行冠婚喪祭之禮，詔下禮官。禮官安習故常，以古今異俗爲說，先生獨以爲可行，且謂：『稱不可者非儒生博士所宜。』」眾莫能奪，然議卒不決。郊廟之禮，禮官預焉。先生見禮不致嚴，亟欲正之，而眾莫之助，先生益不悅。會有疾，謁告西歸」（〈行狀〉）。蓋先生之復起，本欲行道；道既不行，即當浩然而去。此與孔子之去魯，孟子之去齊，其揆一也。

先生既離京，過洛陽，有詩〈上堯夫先生兼寄伯淳正叔〉云：「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病肺支離恰十春，病深樽俎久埃塵；人憐舊病新年減，不道新添別病深。」（均見《全書·卷十三》，頁12至13）並語二程曰：「載病不起，尙可及長安也。」（《全書·卷十五》，頁10）惜乎行抵臨潼，「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道學傳〉），享年五十八，時熙寧十年十二月乙亥也。（註16）

「歿之日，惟一甥在側，囊中索然。明日，門人之在長安者，繼來奔哭致賻襚，始克斂」（〈行狀〉），遂於是月奉柩歸殯於家。次年（神宗元豐元年，1078）八月癸酉葬於其父墓南之兆。「治喪一用古禮，以終先生之志」（〈行狀〉）。（註17）「翰林學士許將等言其恬於進取，乞加贈卹，詔賜館職半賻；

〔註16〕 神宗熙寧十年爲西元1077年，吳康及勞思光咸以爲橫渠之卒年爲西元1078年，因農曆十二月則太陽曆已入第二年矣。（見吳康《宋明理學》，頁116；勞思光《中國哲學史·三卷上》，頁184）此說可爲參考，但農曆十二月亦有陽曆不入第二年之可能，此須精密之推測乃能得其實。

〔註17〕 司馬光《論謚書》云：「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

「(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曰明公；(孝宗)淳熙元年，封郕伯，從祀孔子廟庭」(《道學傳》)。

司馬光〈子厚先生哀辭〉云：「人生會歸盡，但問愚與賢；借令陽虎壽，鉅足驕顏淵；況於朱紫貴，飄忽如雲煙；豈若有令名，高出太白顛。」(《溫國文正司馬公文集·卷五》，頁10)先生去今雖近千載，然其人品風範將與其著作同其不朽。

橫渠歿後，弟子蘇昞、三呂(呂大忠、呂大鈞、呂大臨)兄弟皆歸程門，范育等或仕宦，或散亡，〔註18〕關學因之式微。明道曰：「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遺書·卷二下》；《二程集》，頁50)言下似有譏貶之意。全祖望曰：「關學之盛，不下洛學，而再傳何其寥寥也？亦由完顏之亂，儒術并爲之中絕乎！」(《宋元學案·卷三十一》，頁1)此固是一端，然關學之衰，實不自完顏之亂始也。謝顯道曰：「橫渠教人，以禮爲先，大要欲得正容謹節，意謂世人汙漫無守，便當以禮爲地，教他就上面做功夫。然其門下梢頭，溺於刑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喫木札相似，更沒滋味，遂生厭倦，故其學無傳之者。」(《上蔡先生語錄·卷之上》，頁3)由是知關學之衰，在後學者之未能善繼師道也。蓋禮必歸本於性命，若徒溺於刑名度數，失其本矣，無異乎關學之衰也。

全祖望曰：「世知永嘉諸子之傳洛學，不知其兼傳關學……周浮沚、沈彬老嘗從藍田呂氏遊，非橫渠之再傳乎？」(《宋元學案·卷三十二》，頁1)〔註19〕又田腴爲橫渠弟子。「田腴，字誠伯……嘗言近世學者無如橫渠先生，正叔其次也，蓋其守關學之專如此，右丞呂好問兄弟嚴事之。」(《宋元學案·卷三十一》，頁24)〔註20〕故純就師承而言，關學並未完全中絕也。

漢魏以下蓋不足法。」(《全書·卷十五》，頁14)

〔註18〕橫渠門人見《宋元學案·卷三十一呂范諸儒學案》，除上所舉五人外，游師雄、种師道、潘拯、李復、田腴、邵清、張舜民、薛昌期等尚有可考，餘皆不詳。

〔註19〕「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也，學者稱浮沚先生，……從伊川遊，呂與叔時在同門，先生亦師事之」；「沈躬行，字彬老，永嘉人也，……古靈之再傳也，已而從伊川，兼師同門藍田呂氏」。(分別見《宋元學案·卷三十二》，頁1及頁7)

〔註20〕呂好問、呂切問，呂希哲之子也，見《宋元學案·卷二十三蔡陽學案》。

第二章 思想淵源

第一節 儒學以內之因素

一、先秦儒學之啓示

先秦儒學，成德之學也。成德之學，原係我華族文化之命脈，早見諸《詩》、《書》等古籍之中。及周德衰，原屬滋養德性之禮樂，反成桎梏心靈之虛文，是故孔子有「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之歎。於是孔子乃透過道德主體之自覺，實踐根於人性內在之仁德，以成就完美人格之典型。「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孔子不獨有此自信，並以仁當機指點學者，使其惻然覺醒，以光暢其生命。故孔子不獨予傳統禮樂以一內在德性之根據，並啓後世德慧生命於無窮也。「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論語·子罕》），此是孔子由德性之純亦不已中，透悟天道之於穆不已也，是謂踐仁以知天。

孟子「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公孫丑上〉）。於是將孔子所說之仁，推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以為仁、義、禮、智原係根於心之道德理則，不假外求，若能反身而誠，則人皆可以為堯舜。成聖成賢，舍擴充道德本心之外，別無他途。「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盡心上〉），推擴此一道德本心，則性命天道皆在其中，是謂盡心知性以知天。此與孔子之踐仁以知天，實乃同道德進路，故陸象山曰：「夫子以仁發明斯道，其言渾無罅漏；孟子十字打開，更無隱遁。」（《象山全集·卷三十四》，頁5）